



□ 刘立祥



杜佑（735年—812年），字君卿，京兆万年（今陕西西安）人，唐朝政治家、史学家。历任济南郡参军、抚州刺史、江淮水陆转运使、户部侍郎、岭南节度使、淮南节度使等职，在唐德宗、顺宗、宪宗三朝任宰相，封岐国公。杜佑宦海一生，政绩卓著，倾36年心血撰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典志体史书《通典》，以终生手不释卷的三朝宰相名标青史。

门荫入仕

杜佑出身于唐朝显赫的世家大族之一——京兆杜氏家族，自汉至唐，杜氏一门代有人物，权威炽盛，当年长安有民谚云：“城南韦杜，去天尺五”，意即韦氏与杜氏这两家名门望族，历代衣冠鼎盛，与皇帝近在咫尺，占尽风光。

天宝十一年（752年），杜佑以门荫入仕，为济南郡参军，天宝十四年（755年），安史之乱爆发，杜佑由济南匆匆南下越州，赴任剡县县丞。赴任途中，杜佑前往拜访润州刺史韦元甫，因为韦元甫与杜佑的父亲杜希望是多年好友，便没有按官场的套路来接待他，将他待若至亲。其时，韦元甫正在审理一个案子，遇到了诸多麻烦，悬疑重重，一波三折，拖了许久无法做决断。韦元甫思考一考杜佑，便把这桩疑难案子交给了他。杜佑顺藤摸瓜，爬梳剔抉，接手办案没几天，就把案情弄了个水落石出，作出公正判决，涉案人无不口服心服。韦元甫大为惊奇，由衷地感叹杜佑是一个旷世奇才。

如此优秀的人才，岂能与之失之交臂。韦元甫奏请朝廷，将杜佑留在自己身边，任润州司法参军。后来，韦元甫先后调任浙西、淮南节度使，韦元甫都上疏朝廷，举荐杜佑，请求安排杜佑在自己的幕府任职，走到哪里就把杜佑带到哪里。

唐德宗大历六年（771年），韦元甫病逝。杜佑应召从淮南入朝，先是担任工部郎中，充任江西青苗使，后历任抚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容管经略使。杨炎任宰相时，先后任尚书省金部郎中、水陆转运使、度支兼和兼使。当时，战事频仍，军队的粮饷供给主要靠漕运，朝廷赋予杜佑全权主持漕运一切事宜之权。

由于安史之乱以来社会长期处于战乱和动荡之中，到了唐德宗建中初年，百姓穷困，民生凋敝，连国家赋税都无法征收，国库空虚，国家财政捉襟见肘。杜佑认为，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是推行改革，撤并机构，裁减冗员。他上疏德宗，强烈呼吁推行改革已刻不容缓，在充分理论论证的基础上，援引历代精简机构、裁汰冗员的案例，以强调推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并特别指出，周穆王时只有伯璫一人任太仆，现在有太仆卿、驾部郎中、尚辇奉御、闲廐使，由原设置一个岗位一个人增加至四个岗位四个人……官员太多，官府人浮于事，事情愈发严重，怎么能不改革呢！可是，一疏上奏，竟石沉大海。

遭忌被贬

其时，奸相卢杞当道，极尽嫁祸栽赃诬陷之能事，党同伐异，排斥忠良。杜佑向来刚正忠直，更不肯阿附，自然成了卢杞的眼中钉。建中三年（782年），卢杞将杜佑逐出京师，任为苏州刺史。杜佑以老母在堂为由，不肯赴任，后又改任饶州刺史。卢杞一再作恶，谗害忠臣，唐德宗终于醒悟，于建中四年（783年）

十二月，贬卢杞为新州司马。卢杞被逐下台，杜佑进入了升职快车道。兴元元年（784年），德宗擢升杜佑为岭南节度使，兼任御史大夫。杜佑主政岭南，很快组织民众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大路，疏散整修街市住宅区的房屋。朱涯、黎州的百姓三个朝代扼守险要，不归附朝廷，杜佑挥师征讨平定了这两个地方。

贞元五年（789年），杜佑升任检校礼部尚书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并充任淮南节度使。杜佑组织当地百姓开挖雷陂，大规模扩大灌溉面积，开垦沿海荒弃的滩涂为良田，大大促进了当地生产发展，积藏的粮食达到50万斛，排列码放在30座兵营，兵强马壮，士气高昂。

“富国安人”

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，杜佑入朝拜相，担任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并充任太清观使。贞元二十一年（805年）正月，唐德宗驾崩，太子李诵继位，是为唐顺宗，诏命杜佑担任冢宰，进位检校司徒，并兼任度支盐铁使。当年八月，在位仅186天的顺宗在宦官俱文珍等人的胁迫下凄然禅位，自称太上皇，太子李纯继位，是为唐宪宗。不久，杜佑进拜司徒，封岐国公。

杜佑是著名理财家，为当时朝廷走出经济困境作出了突出贡献。例如，他非常重视人口统计，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统计估算法，管仲曾根据平均每人的食盐消费量，估算出提高盐价后可增加的财政收入；杜佑则根据当时全国食盐消费量，估算出全国总户数大约为500万户。

元和七年（812年），杜佑身染沉疴，请求退休，唐宪宗依旧不允。杜佑又接连四次上表宪宗，坚决请求退休，宪宗不得已，只得让他以光禄大夫、太保之职致仕，但仍让他在每月初一和十五日上朝，派宦官赐予厚

礼。是年十一月，杜佑溘然长逝，终年78岁，宪宗为之废朝三日，追赠太傅，谥号安简。

撰写《通典》

杜佑自幼刻苦向学，博览群书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功底。他17岁步入仕途，任职四方，主政州郡，又先后在刑、工、户、御史台、度支等多部门交替任职，对当时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诸方面的状况有切身的体味和广泛的了解，对朝政的得失特别是弊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，笃志好学和丰富的阅历使他成为唐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、史学家和理财家。这为杜佑撰写《通典》提供了厚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充分的实践经验材料。

杜佑在宦海沉浮中目睹了开元盛世的励精图治和繁华兴隆，目睹了安史之乱后的政治衰败和社会动荡，促使他从政治得失的视角去探索历史变迁的真正原因。杜佑巧妙地利用这一优势条件，在繁忙的政务之余，宵衣旰食，手不释卷，孜孜以求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倾36年心血，考究历代典章制度的源流，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见解，将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，学以致用，撰成皇皇巨著《通典》。

《通典》成书于唐宪宗贞元十七年（801年），全书共200卷，分为食货、选举、职官、礼、乐、兵、刑法、州郡、边防九典，子目1500余条，约190万字，记述了上至远古黄帝时期下迄唐朝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，其中对唐代制度的叙述尤为详细。

《通典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，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，它的问世使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论此书“详而不烦，简而有要，原原本本，皆为有用之实学，非徒资记问者可比”。

山东省西南部的邹城是一个县级市，地方虽不大，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、千年古县，是邹鲁文化的发祥地，也是战国时期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的故里。邹城古称郛国，又称邾婁，是周代方国之一。第一代国君曹挾，系高阳帝颛顼后裔，被周武王分封于邾。起初，邾国只是鲁国附庸，疆域大致相当于如今邹城全境和周边县市一部分。春秋时期，邾国第十代君主曹克向齐国靠拢，为齐桓公成就霸业东奔西走，于是齐桓公奏请周天子，封邾国为子爵，邾国从此位列诸侯。

历史进入春秋，随着周王朝衰微，诸侯群雄争霸，大鱼吃小鱼，强胜弱汰。到了战国时期，混战更为激烈，很多诸侯国被吞并，仅剩“七雄”活跃在历史舞台。不过，到了战国中晚期，邾国依然存在，只是国名已改为邹国。

邹国，一个蕞尔小国，何以能在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时期存活下来？这个问题，很难找到答案，毕竟有关邹国的史籍极为稀少，即便是其著名君主邹穆公，也没有进入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

邹穆公，名字叫曹路，在位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82—330年之间。尽管他是一国之君，却有一位同时代的人物比他更有名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孟子。邹穆公与孟子彼此有过交集与对话，孟子在著作中做了记载。

那一年，邹国与鲁国发生军事冲突，邹国损失惨重，邹穆公非常郁闷。适逢孟子来访，邹穆公愁眉苦脸，向孟子大吐苦水：这次交战，我手下官吏死了三十三个，士兵却没有一个为他们而牺牲。实在恨他们眼睁睁看着长官战死而不去营救。先生，此事如何处置妥当呢？

孟子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反问道：您可知道，灾荒年岁，百姓有多难？年老体弱的死后弃尸于山沟，年轻力壮的四处逃荒，几乎有上千人；而您的粮仓里堆满粮食，货库里装满财宝，官吏们却不向您报告实情，拒不赈济灾民，这不是瞞上欺下、残害老百姓吗？

邹穆公面露赧色说道：我有所不知，可真有这些事？孟子点点头，接着又说：曾子讲过“要警惕，警惕！你怎样对待别人，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”，百姓当初受到怎样的待遇，现在就作出怎样的回报。您不要怪罪百姓了！

二人此次会晤，于孟子，只是游说诸侯生涯中一个片断、一段记忆；但对于邹穆公而言，则是一次振聋发聩的触动与警醒。那么，邹穆公后来有没有把孟子的话付诸实践呢？

清康熙五十四年的《邹县志·国君志》记载，邹穆公在位期间，“王舆不衣皮帛，御马不食禾菽。无淫靡之事，无骄燕之行，食不众味，衣不杂采，自刻以广民，亲贤以定国，视民如子。”日常生活中，邹穆公十分简朴，与那些锦衣玉食的诸侯相比颇为寒酸。他的车驾朴实无华，从不披挂毛皮、织帛；他的御马不吃禾苗、稻菽，只喂草料；他没有乖僻的爱好，也没有骄横的行为；他吃饭不挑食，不要求菜肴丰盛、色香味俱全；他穿衣也不挑剔，不讲究服饰的质地与颜色。但是，他在治国理政方面毫不含糊，毫不懈怠；他选贤任能，兴利除弊，心系民众，善待民众。故“邹国之治，路不拾遗，臣下顺从，若手之役心”。正因有如此广施“仁政”的贤明之君，邹国虽为小国，但“鲁卫不敢轻，齐楚不能霸”。在邹穆公的悉心治理下，邹国出现欣欣向荣、安定团结的“善治”局面。境内没有盗贼，乡村夜不闭户，道不拾遗；臣民对国君心悦诚服，就像手足与心脏一样紧密相连，荣辱与共、和谐相处。就版图与国力而言，邹国还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，由于它实现“善治”，故而令人刮目相看，甚至肃然起敬，即使是鲁国、卫国这样的大国都不敢轻视，齐国、楚国这样的强国也不能胁迫。

《邹县志》展现了邹穆公“王舆不衣皮帛，御马不食禾菽”的良好品行。他还有最为人们称道的一件事是以粟易民以税而饲鹅。邹穆公陆续推出一系列惠民政策，其中第一项就是禁用粟来喂养野鸭和鹅，往后一定要以秕谷替代。等到粮仓里的秕谷用完了，他就派人到民间采购，以二石粟米换一石秕谷。管理粮仓的官吏觉得这样做太浪费了，纯属亏本买卖，于是向邹穆公请示：咱们用二石粟米换一石秕谷，太不划算了，还不如直接用粟米喂食，岂不更好？

邹穆公回答：你说得不对。百姓在烈日下光着脊背辛勤耕作，不敢懈怠，好不容易种出粟米，难道就是为



□ 陈良

了喂养这些鸟兽？粟米是人吃的好食粮，怎么可以用来喂鹅？你只知道算小账，却不懂得算大账。周人有句俗话说：“盛粮食的袋子漏了，也都是漏在仓里。”难道你就不明白此话道理？君主是老百姓的父母，我们把粮仓里的粟米转移到百姓家中，难道就不是国家的粟米了吗？让鹅吃这些秕谷，为的是不糟蹋国家的粟米。无论粟米贮存在粮仓里，还是存在百姓家中，对我来说是一样的，有什么好选择的？

邹穆公这番话传开，百姓心里倍感温暖，觉得国君把他们视为自家人。因此，邹国百姓懂得国与民相互依存，公家储粮与私家藏粮其实没有本质区别；君主体恤百姓，百姓也乐于为国出力分忧。

邹穆公去世之后，邹国百姓都非常悲痛，就像死了自己的慈父，哀哭三个月。邹国四邻的百姓，听说邹穆公过世了，也朝着邹国方向揖拜。失去了这么好的国君，邹国上下哀伤不已，民间自动停止一切娱乐活动，直到一年之后才能听到琴瑟的声音。

西汉政论家贾谊对邹穆公颇为欣赏，认为他之所以深受民众爱戴，是他施行仁政的回报。俗话说，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”付出仁爱的人，也会得到人们的敬爱；造福他人的，也会收获福报。《易经》有言：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”意思是说，白鹤在山林鸣叫，它的同类声声应和。表明同类事物相互感应，人与人之间、国君与国民之间更是如此。是故，贾谊认为，“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；诸侯有道，守在四邻。”也就是说，帝王或诸侯政治清明，就会得到人民拥护，就不会发生内患，只需要防境外敌人就可以了。至于孟子，他作为土生土长的邹国人，在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后，也埋葬于斯。清康熙五十四年的《邹县志》记载了四基山的孟子墓：“在云山东南。顶有石，其状如基，其数有四，故名。山之西麓孟子墓在焉。”



方志里的故事

在自省中不断进步

□ 王 杰

次之后，邹忌认为自己的确要比徐公更为好看。几天后，徐公来邹忌家拜访，邹忌仔细端详着徐公，觉得自己远不如徐公好看；照着镜子看了看自己，又看了看徐公，还是觉得自己远不如徐公。

这件事，引发了邹忌的思考：为什么自己长得远不如徐公好看，但自己的妻妾和客人都说自己比对方好看呢？思考了整整一夜，邹忌终于找到了答案：他们都是在昧心地恭维我罢了。我的妻子是因为偏爱我，我的妾是因为害怕我，而我的客人则是有求于我。如此看来，我是因为身边人的恭维和赞扬而迷失自我了。

经过这番自省之后，邹忌便去拜见齐威王，将这番言论告诉了齐威王，并说道：如今的齐国，方圆千里，一百二十座城池，宫中无一人不惧怕大王，害怕大王，有求于大王。由此看来，大王受到的蒙蔽一定很严重了。齐威王接受了邹忌的建议，大开进言之门。

邹忌的自省帮助齐威王赢得了更多的民心，燕、赵、韩、魏等国纷纷前往齐国朝见。自省，所有的不仅是错误，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。时刻自省，才能从中获益。

将相和的故事从古流传至今，每一次读都能读出不同的含义，有人说将相和告诉我们要胸怀宽广，有人说将相和告诉我们要以大局为重，也有人说将相和告诉我们要容忍谦让，等等。我认为，将相和旨在告诉我们一个人自省的重要。

渑池会之后，蔺相如劳苦功高，赵王封他为上卿，地位在赵国将军廉颇之上。廉颇知道这件事之后十分不满，认为蔺相如只是个平民百姓，靠着几句话便被封为上卿，扬言若是以后见到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羞辱他。蔺相如听到之后，每次都会刻意回避，每次到上朝的时候都会推说身体不适。有一次，廉颇外出，在一条巷子里远远看到了蔺相如，便命人将车驾到巷子中间，丝毫不给蔺相如留位置。蔺相如看到这幕后就叫人调转车头回去了。

蔺相如的门客看到之后，就说：我们不远万里来投奔您，就是仰慕您高尚的节义，如今您却处处害怕廉老将军，让我们都感到羞耻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请允许我们告辞离去。蔺相如听了门客的这番话，就问他们：你们认为秦王和廉将军谁更厉害？门客回答说：当然秦王更厉害啦。蔺相如继续说：以

秦王的威势，我敢在朝廷上呵斥他。我蔺相如虽然不会打仗，但我也不会惧怕廉将军，我只是知道，秦国之所以不敢出兵赵国，就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在，一旦我们两虎相争、两败俱伤，秦国一定会趁乱而入，攻打赵国。

这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中，廉颇静下心来认真反思了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于是他便采取了补救措施，负荆请罪。千百年来，负荆请罪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，被传为佳话。

不论是谁，一旦忘记了反思，不愿意反思，那么终将酿成悲剧。自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，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具有永恒的历史意义。提倡自省，要求每个人重视自身行为，不为外界事物所迷惑，要经受住外在诱惑的考验，保持对自身行为的清醒认知。倡导“自省”，形式上是对行为的自我反省，实质上体现的是对人行行为的一种敬畏。这种敬畏有助于促进形成社会秩序，而社会秩序正是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得到治理的基础。

